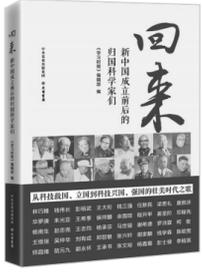


■ 责编手记

深感使命在肩
唯有精益求精

□ 李瑞琪 王佳伟

《回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归国科学家们》是大友书局今年3月出版的一本新书，书中讲述了40位1940—1958年间归国的科学巨匠的爱国之心与报国之行。自出版发行以来，该书广受各界关注与好评，《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广州日报》等媒体均进行了报道，并在世界读书日当天荣登当当“科学家新书榜”第一位，而后又入选“京华好书”2023年第二期书单。



■ 等待：因为值得

2021年4月，我们关注到《学习时报》科技前沿版开设了新的栏目《归国科学家》，聚焦新中国成立前后毅然回国、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该栏目的首篇文章记叙了王大珩为了祖国，放弃近在咫尺的博士学位，在工厂掌握研制光学玻璃的技术后毅然回国的故事。我们读后，深深为王大珩胸怀祖国、深谋远虑的爱国之心所打动。王大珩作为“863计划”的提出者之一，已经为社会大众所熟知，但其早期的留学及归国经历，却令人耳目一新。我们敏锐地察觉到，《归国科学家》栏目要做的不是泛泛的宣传，而是既生动又有温度的讲述。

这是个好选题！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积极与负责该栏目的编辑张丹丹取得联系，得知该栏目的编写者除专业的记者外，还有科学家的学生、同事和家人，由于这种源自一线的真实，文章避免了生硬刻板，从而显示出鲜活的魅力。基于报纸这一媒介的特点，稿件由不同作者创作，一篇一篇地刊发，想要能够成书的稿件，需要等待。

■ 创新：拒绝照搬

2022年7月，距离初次与《学习时报》编辑部沟通已过去了一年多，报纸上刊登的稿件也已有36篇，我们认为，是时候收稿了。8月，40篇原载于《归国科学家》栏目的人物小传整理成稿。这时，每篇文章都是独立的，篇与篇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关联。这样出版未尝不可，但我们还是尝试着为图书理出一条脉络。

经过讨论，我们选择以科学家归国时间为序串联起这些故事。从目录上不难看出，1950年与1955—1956年是海外科学家归国的两个高潮，这背后是国家实力的提升和艰难的外交谈判。我们试图通过这样的编排方式直观地向读者展示，不仅科学家们在为归国煞费苦心，祖国也从未忘记这些客居异乡的游子，这是一场跨越重洋心照不宣的双向奔赴。

■ 严谨：一丝不苟

尽管书稿收录的文章都已经在《学习时报》上公开发表过，我们做起“三审三校”来仍坚持与其他书稿同样严格的标准。书中写道，彭桓武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后题写了“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网络上亦可见其他媒体刊发的文章如此表述。然而，经过核查，我们找到了老先生题字的图片资料，确认此处应改为“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目前，写科学家故事的书刊资料很多，核查工作看似变得容易，实际上对编辑甄别信息的能力要求更高了，一定要查到切实出处，避免人云亦云、误导读者。

人们常说，百闻不如一见。尤其对于《回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归国科学家们》这样的传记类图书，读者自然会好奇文字背后的主人公到底有着怎样的面容。原本每篇文章只配有一张科学家小像。相较于文中情感充沛的文字表达，这样的图片展示显然是略显逊色的。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们积极为本书寻求恰当、优质的插图。最终，在《学习时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身边朋友的帮助下，我们获取了20余张科学家工作或生活场景的照片并将其放入文中，更加鲜活地向读者展现了科学家的形象。

■ 打磨：优中取优

关于书名，我们先后与《学习时报》编辑部经过了一番讨论，曾想过“大国铸魂”等名称，以此表现这批归国科学家对祖国科学事业乃至全社会发展所作的突出贡献。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用“回来”作为主书名。“回来”是科学家漂泊海外时最深切的念想，也是祖国对异乡游子的殷殷期望；“回来”是科学家回到一穷二白新中国的艰难跋涉，也是新时代中国对海外青年科学家发出的声声呼唤。

爱国是科学家精神之魂。为了让读者在拿到书的第一时间就能感受到这种磅礴的精神伟力，我们将科学家们的话节选出来以暗纹的形式放在封底。如王承书院士说，“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钱三强院士说，“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封底铺满版面的语录之上，是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家座谈会上所讲的“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是对老一辈科学家爱国精神的高度总结。一句句简短有力的肺腑之言，一段段浩气长存的报国之行，直抵人心，催人奋进。

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余国琮、张兴铃、李桓英3位科学家先后去世；图书即将加印时，获得“七一勋章”的陆元九也因病逝世。亲手补充上4位大师生平的时候，我们悲痛感伤之余，更感到出版此书时间之紧迫、责任之重大——有幸在历史的长河中与这些科学家同行，就应当义不容辞地及时讲好其迎难而上、生动感人的故事，将科学家精神传播得更加广泛。

(作者单位：大友书局)

用出版架起文明互鉴的金色之桥

□ 王利明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文明交流互鉴，近日，他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致贺信。在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我们出版工作者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化是出版的内容，出版是文化的载体。作为记载、传播、交流、延续文化成果的最重要载体，出版承担着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和发展的重任。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出版自古以来就发挥着人类文明传播和交流互鉴的作用，各国各民族图书的传播交流史，也就是人类文明互鉴史。

从人类丰富的典籍中，我们看到多样性的世界文明有着重要的共性特征，构成了人类文明互鉴的深厚根基。

人类对人生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和追求是文明互鉴的深厚根基。由于人类生活地域和历史文化不同，形成了包罗万象、千差万别的世界文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也增加了文明交流和相互理解的难度。中国有位学者钱锺书，曾留学牛津大学，通晓6种外语，对人类文明深有研究。他在《谈艺录》中写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未未裂。”他认为东西南北乃至全世界的心理，都有它的一致性和共同性，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使人人类文明互鉴成为可能。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了理想国的构建，设计展望了心目中理想国度的蓝图。中国记载先秦制度的《礼记》描述了“大同盛世”“小康社会”的美好图景。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人们都在追求幸福，都希望拥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生活环境，都有着共同的期盼、相近的追求和一致性

的需求。这是人类文明互鉴的共同基础，也使得文明互鉴有了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出版的历史作用看，出版在文明互鉴和现代化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纵观历史，出版是文明互鉴的重要方式，促进了不同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唐代中国高僧玄奘到印度学习佛教文化，带回大量佛经，撰写了记述亲身经历的《大唐西域记》，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在1300年后，《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中古印度史的重要文献。印度历史学家阿里曾经这样评价：“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该书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西班牙时曾发表署名文章，讲到中国和西班牙有悠久的历史交流史：“明代，西班牙人庞迪我将西方天文、历法引入中国，高母羡将儒家著作《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语。塞万提斯在作品中多次提及中国，其不朽名著《堂吉珂德》在中国广为流传。历史表明，尽管相距遥远，但中西文明交相辉映、相互吸引，坚持走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道路。”《明心宝鉴》是中国译介到西方的第一部典籍，1590年左右由天主教士高母羡将其译成西班牙语。高母羡的中西双语本手稿现珍藏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这部400多年前的手稿2023年在中国影印出版。手稿文前有一封致西班牙费利佩王储的信，讲道：“道明会将中华帝国的第一笔财富作为贡品献给陛下。中国人看作真正巨额财富的，不是黄金白银，不是绶罗绸缎，而是书籍和智慧，还有品德及其正确的管理制度：他们对此重视，赞美，以此为荣，有良好教养之人（不在少数）往往谈及于此。因此，道明会将译成卡斯蒂利亚语的《明心宝鉴》献给陛下，它是中国哲学家诸多格言的汇编，均为德育教

材；力图使人顺应天命，引导其走向自然之光揭示给我们的尽善尽美。这是世界从中国语言文字译成其他语言文字的第一本书。”这部书在400多年前架起了中西文明互鉴的一座桥梁，对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在16世纪就传入西方。1687年拉丁文版《中国贤哲孔子》在巴黎出版，孔子及其学说在法国引起广泛重视。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他把元代戏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五幕孔子伦理观”，并说，假如世人都像孔子那样仁义，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学界普遍认为，儒家思想是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对法国文明现代化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三人行，必有我师。”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开放和包容的胸怀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1920年问世，对中国社会和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丛书收录世界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开阔了中国几代读者的视野，在文明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未来发展看，出版将继续在文明互鉴和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有丰厚的文化资源，能够给世界文明互鉴和现代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经济、科技加速融为一体。同时，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也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出版物作为一个国家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它像一位“和平大使”，能够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加深了解、相互理解、消除文化隔阂，达成共识，促进民心相通，从而

保障世界的和平稳定。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20世纪70年代说，以儒、释、道、汉语为支柱的中华文化，必将影响全世界，给世界带来安定、和平、繁荣、幸福。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发布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各民族文化中都有与之相同或相似的理念，可以被视为道德金律。人类只要能够守住这个底线，其文明还有希望，社会秩序能够恢复，还能朝着好的方面转化。

《礼记·中庸》里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实现这个理想，就意味着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和谐共存，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君子和而不同”，就是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在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处理好关系的核心就是关心他人、尊重差异，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这样，我们就能够打破“文明冲突论”的魔咒，在这个美丽星球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现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近年来，中国出版业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季羨林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创立了“东方学”，让世界系统深入地了解东方文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收集全世界馆藏的中国古代书画，出版物已经陈列到海外上百座图书馆，让世界了解中国文明。这都是中外合作的出版成果。下一步，出版业将继续发挥产业特色、行业优势，为世界文明互鉴和现代化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作者系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本文系作者在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上的发言)

■ 出版背后

《红色文物中的长征》：

两年打磨让设想落地“掷地有声”

□ 本报记者 范燕莹

两年前，广西人民出版社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它是一部以红色文物呈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成长史的通俗党史读物。该书是“跟着红色文物学‘四史’”系列的首本图书。时隔两年，这一系列再添新作——《红色文物中的长征》出版。这成为广西人民围绕“四史”题材，进行横向、纵向立体化选题开发的最新出版成果。

■ 巧妙选取角度邀请权威专家撰写

近年来，“四史”类主题读物不断涌现，如何体现心意、如何做出新意，考验着出版人的出版眼光和选题策划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要学好“四史”，同时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作过多次重要指示。广西人民出版社结合这两点进行思考，为“四史”类图书选题提供了一个探索方向：从红色文物的角度策划一套“四史”学习教育读物，成为广西人民出版社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策划推出“跟着红色文物学‘四史’”系列的初衷。

2021年，恰逢建党百年之际，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第一本《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该书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精品出版展、广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出版重点选题、“遇见广西好书·2021”主题出版类好书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为双方的后续合作打下了很好的根基。因此，在《红色文物中的长征》出版过程中，双方沟通非常顺畅，对于大纲的撰写，主要围绕“物”和“史”的结合如何能够更顺畅，前后修改了3次，力求做到长征大事不漏、长征部队不遗漏、长征精神不遗漏。

从书名即可看出，《红色文物中的长征》不是泛泛地讲述长征，而是通过长征文物串联起整个长征的历史。在作者团队的选择上，经过双方沟通，最终确定由馆内拥有策划长征展览经验的江琳、王海蛟、王希3位专家参与写作，充分运用他们长期在长征文物方面积累的既有经验和想法。策展人的经历对编



在第二十九届中国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红色文物中的长征》作者代表江琳(台上左二)正在讲述《红色文物中的长征》出版背后的故事。

广西人民出版社 供图

写《红色文物中的长征》这样以文物来讲述历史的书籍，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选取的文物一定具有典型性，会考虑文物的内涵、意义、形态等多方面的因素；我们使用的语言避免太过学术化，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在前不久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举办的《红色文物中的长征》推介会上，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该书作者之一江琳这样说。

谈到作者团队的选择，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长征史专家陈力这样称赞道：“作者利用长期在国博工作、熟悉中国革命史，特别是革命文物与长征文物的有利条件，依托一件文物，讲述一段故事，还原一段历史，从而把长征中的重要节点、主要战役战斗、重大事件、著名英烈等串起来，形成相对完整的史实链条，讲述有血有肉细节，将一部红军长征史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 以文物为引解读重要事件和节点

国博有近千件长征文物，曾举办过数次大型长征展览，但细心的读者会发

现，在近千件长征文物中，《红色文物中的长征》却仅仅重点选择了其中的30余件。为什么不是越多越好？可以

说，这恰恰体现了《红色文物中的长征》创编团队特别的用意，也体现着双方对于该书有着明确的出版定位。“选取的文物具有典型性，选取的数量又不是太多，也不想让读者淹没在大量的历史信息当中，以点带面是这部书的独特之处，可以通过一件件‘活起来’的红色文物，串联起惊天动地的长征壮丽史诗。”江琳说。

■ 匠心打造融媒体长征主题读物

好内容还需要好的形式呈现，两个要素缺一不可。为了让这本书有比较好的呈现效果，广西人民出版社曾荣获“中国最美的书”、中国出版传媒奖装帧设计奖的设计师操刀打磨整体设计，为长征文物及整本书打造独特的呈现形式，封面、封套、目录等设计均独具匠心，配上国博馆藏的高清文物图片，四色全彩印制，舒朗、悦目，极具视觉美感。

在呈现形式上，如果将《红色文物中的长征》简单地总结为图文并茂，那还不够准确。准确地说，它是一部红色主题的融媒体读物，书中除了精选长征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物，讲述文物背后的历史，还配以高清精美图片，书中配套音频、长征纪录片、《长征》等纪录片，收听《红色文物100》等相关有声书，帮助读者全方位了解长征历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出版一部以文物为载体、以时间为线索，让读者看得懂、有故事，做到见人、见事、见史的长征读物，这是双方策划和撰写《红色文物中的长征》的初衷。”

从策划、组稿、编辑，再精心修改，反复打磨，《红色文物中的长征》创编团队用了两年时间，不但让当初的出版设想落地，而且做到了“掷地有声”。